论《山海经》中猴类图像与金猴面具之生命美学意蕴

Aesthetic Implication of Life of Monkey Images and Golden Monkey Masks in the
Book of Mountains and Seas

唐晓梅

Xiaomei Tang

攀枝花学院艺术学院

中国·四川 攀枝花 617000

School of Art, Panzhihua College,

Panzhihua, Sichuan, 617000, China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7CZ006】

【摘要】《山海经·山经》开篇即叙述了猴类聚居的巴蜀山脉,因而,猴类图像及其审美寓意与中华文化息息相关,具有了生命审美的同一性。甲骨文中的“𪙇”字像是一只正要搔首弄姿的猴子。先秦文献猴字异名近 30 余种。《山海经》中猴类图像为狌狌和白猿等,这种半兽半神古图形象,不仅是古巴蜀人崇拜的偶像,而且为金沙遗址之金猴面具的制作提供了审美参照系。三星堆、金沙出土的金面具与古埃及、辽国陈国公主金面罩不仅制作工艺不同,且有不同的用途和文化内涵,因而是自成生命审美意蕴的古巴蜀黄金文化现象。

【Abstract】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ook of Mountains and Seas*, the Bashu Mountains where monkeys live together are described. therefore, monkey images and their aesthetic meanings are related to the interes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ave the aesthetic identity of life. The character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s like a monkey who is about to scratch his head. There are nearly 30 kinds of monkey characters in the pre-Qin literature. The images of monkeys are Euphorbia and White Apes. This kind of ancient image of semi-beast and semi-god is not only the idol worshipped by the Cubans, but also provides an aesthetic reference frame for the making of the golden monkey mask. The gold masks unearthed in Sanxingdui and Jinsha are not on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princesses of ancient Egypt and Liao, but also have different purpose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erefore, they are the gold cultural phenomena in Shu of Guba with their own life aesthetic implications.

【关键词】猴类;猴金面具;生命美学

【Keywords】monkey; monkey gold mask; life aesthetics

【DOI】10.36012/sde.v1i3.509

1 引言

论《山海经》中猴类图像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金猴面具之生命美学意蕴,首先得确证《山海经》中猴类生存的地缘生态空间。《山海经·山经》开篇即曰:“南山经之首曰鹑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郭璞注鹑山云:“在蜀伏山山南之西头,滨西海也”。段玉裁注云:“伏山”,即“汶(蜀)山”,也就是四

川盆地西部的岷山,而“西海”,因盆地内陆湖泊干涸,“西海”便无考^①。而岷山下的“江水”河谷地带,却是古羌族分支纵目人蜀山氏的发祥地。就在那里生长着“狌狌”和“白猿”等猴类,成为远古巴蜀人最早模仿的生态审美对象,并画出古图,录入经中,开始以图记事。

然而,古代有关猴类异名多达 30 余种,因而,《山海经》中猴类“狌狌”和“白猿”之图像及其审美寓意与华夏文化息息相

关联,便具有了生命审美的同一性^[2]。中东部地区,早在一些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上就出现了猴的形象,这样的造型在其后出土的红山文化遗址文物上多有表现。

在远古时代,古人最早将“猴”写成“𪙔(náo)”,殷商甲骨文中的“𪙔”字像是一只正要搔首弄姿的猴子。在甲骨文中还保留着多个“𪙔”猴形文字,字形或朝左,或朝右,怎么看都是一只活灵活现的猴子。有的猴儿似乎在挠痒痒,有的猴儿正拼命往嘴里塞吃的,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贪吃猴”形象了。“𪙔”这个字东汉许慎在《说文》中的解释是:“𪙔,贪兽也,一曰母猴,似人^[3]。”《说文解字》解释为“母猴,似人。母猴是‘沐猴’的音转,也就是今天说的‘马猴’‘猕猴桃’。”“𪙔”字,如同展示的对象生命链,成为对象生命美的自由象征。经过考察还可以看到“𪙔”还保留着古图语的原型,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汉字,而是一种“准文字”,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审美的意义。所以,“𪙔”字在甲骨文中写为猴形,既代表殷人的某位“高祖”,也代表猕猴桃和神祇^[4]。除了“𪙔”字,“猴”在“《诗经》中出现过‘猱’,《左传》中出现过‘猱’,《国语》中出现过‘𪙔’,《庄子》中出现过‘狙’,《楚辞》中出现过‘猿’和‘猱’^[5]等文字。而《山海经》中“狌狌”和“白猿”之猴类图像大体为“人兽结合”的“人面猴身”或“猴面人身”,这种古图还不是图语,却包含着丰富的意蕴,成为远古人类生命审美对象化的载体。因此,这种“猴形神人”或“猴祖神”的形态,形象地表现了“人”是由“猴祖”衍变而来的。所以,其与甲骨文中的“𪙔”字都具有生命审美的原形意识,同时成为金沙遗址猴金面罩模仿的对象,而猴金面罩不过是统治者在其宗教祭祀活动或娱乐活动中的道具罢了。而古代的宗教活动,正是古代人开始不自觉审美的萌芽。殷商时期,猴子在中原并不多见。在考古文物中,中原青铜器上很少有猴子图案,而在云南一带的滇国青铜器上,猴子则是重要的元素。晋宁石寨山 12 号墓出土过一件西汉青铜钺,上面铸有一只灵动野性的猴子,昂首挺胸,口中衔蛇,堪称猴中之王。中原猴子数量少,和先民的生活直接关系不大,而主要是作为一种具有一定审美意蕴的文化现象。直到汉字形成,也没有给“𪙔(猴)”设立部首,而是从犬,被《说文》收入《犬部》。同样是生肖,在这一点上,猴子的地位比马牛羊低得多,猴子不过是一种玩物——审美对象。《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曰:“宋人有请为燕王以棘刺之端为母猴者,必三月斋然后能观之。”“以棘刺之端为母猴者”,如果去掉功利性,剩下的就是审美了。而通过这一记载,人们也得知:“猴”字在先秦时代已经产生了,但是,在汉代以前,“猴”字是从不单独使用的,“猴”字取代那 30 余种猴的异名,已经是汉代的事了。

2 《山海经》中猴类生命审美图像

2.1 狌狌图像

《山海经》开篇对狌狌描绘道:“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6]”。依据前人的注释,人们得知:鹊山、招摇之山,即蜀山,蜀山或名曰汶山、岷山。在那里的兽类就是狌狌,长相很像猕猴(禺),却长着一双白色耳朵,而且这种动物有一种特点,就是时而四肢着地爬行,时而人立行走。因此,《说文》中有一个专门的字“禺”,释为“母猴属,头似鬼。”“愚”从“禺”“愚,戇也。禺,猴属,兽之愚者。”这是许慎如同审美一样对其相貌的品评。袁珂先生搜集的明清古图中,图像已经人性化了,展示了猴与人的生命渊源。袁珂先生对于狌狌的注解:“王念孙云:‘类聚兽部引作有兽人面,名曰狌狌。’珂案:狌狌即猩猩。”另外,《山海经》中对于狌狌(猩猩)的描述还有几处:《海内南经》:“汜林方三百里,在狌狌东。”《海内南经》:“狌狌知人名,其为兽如豕而人面,在舜葬西”。《海内南经》:“狌狌西北有犀牛,其状如牛而黑”。《海内南经》:“窋窋(yù yǔ)龙首,居弱水中,在狌狌知人名之西,其状如龙首,食人”。《海内经》:“有窋窋,龙首,是食人。有青兽,人面,名是曰猩猩”。这种龙首而猴身的窋窋,其实是古人崇拜的神祇,把龙首与猴身组合起来的古巴图像,是古人通过想象甚至幻想使其原型意识达到审美对象化,从而给狌狌赋予了新的审美生命力。《海内南经》中有“夏后启之臣孟涂司神于巴”的记载,夹在犀牛和窋窋的记载中间,因此,可以确定《海内南经》对于此处的描述亦是古代巴蜀地区,那么,古代巴蜀就是一个聚居着大量猴子(猩猩)的生态美的地区,猴子多到人们一说到狌狌,就能够想到说的就是那里。猴子的图像已经成为那一区间的社会审美意识^[7-12]。

2.2 白猿图像

猿类一般为黑色或者棕色,白猿则极少见。《南山经》:“又东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多棗木,多白猿,多水玉,多黄金。”再往东三百里,是座堂庭山,在这座生态山上生长着茂密的棗木,又有许多白色猿猴,还盛产水晶石,并蕴藏着丰富的黄金。人类本来对猿猴类就比较关心,以为神秘,甚至神圣,如果发现一个“白猿”,那一定会更加让人觉得神秘奇妙,自然也就赋予它更大的生命力量和神通。从某种意义上说,“白猿”代表了人类生命的深层次精神愿望,即人的本能,是人类审美理想的载体。例如,《太平广记》卷四四四引《吴越春秋》云:“越王问范蠡手战之术,范蠡答曰:‘臣闻越有处女,国人称之,愿王请问手战之道也。’于是王乃请女。女将北见王,道逢老人,自称袁公,问女曰:‘闻子善为剑,得一观之乎?’处女曰:‘妾不敢

有所隐也,唯公所试。’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枯槁,末折堕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处女,处女应节入之三,女因举杖击之。袁公飞上树,化为白猿。”袁公败而化为白猿飞上树,表征的是猿静而深沉的本性,展示给读者的,更是一种同神入化的生命审美境界。

《山海经》中猿之同名者为“蜃”与“猿”。如《中山经》:“又东南三百里,曰丰山。有兽焉,其状如蜃,赤目、赤喙、黄身,名曰雍和,见则国有大恐。”这种如蜃之兽,名称雍和,其赤色的眼睛,赤色的嘴脸,一身黄毛,人们见了非常惊恐。其实,雍和就是“赤秃猴”,在中国已经灭绝,现生活在南美洲,其拥有令人震惊的红脑袋。又如,《南山经》:“又东三百八十里,曰猿翼之山,其中多怪兽,水多怪鱼,多白玉,多蜃虫,多怪蛇,多怪木,不可以上。”“猿”即猿。其实,在古人心目中“猴”和“猿”是有区别的。比较有名的说法是宋代柳宗元提出的“猿静猴躁”说。事实上,早在《说文》中“猿”和“猴”就有所区别——獼、狢、狙、猴从犬,猿则写作蜃,从虫——《说文》归部有区别义类的功能,蜃、猴分部,就说明它们不是同种群,具有不同的审美意蕴。

2.3 禺类图像

《南山经》曰:“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郭璞注:“禺似猕猴而长,赤目长尾。”“禺”在《山海经》中常用作神名,例如,东海神‘禺号’、北海神‘禺京’。总之,它们所描写的与其说是作为动物的猴子,不如说是猴类动物的某种奇异功能。”“《山海经》中的‘其状如禺’以及‘禺京、禺号、禺彊、禺水、禺谷、禺中之国’等,乃是周边民族猴祖神话在华夏的遗存。这些民族对猴祖的崇奉造成了猴在华夏文化中的神化。”《山海经》的哲学思想,就是神化思想,这种神化思想,也就反映了古人的生命审美理想。鲁迅在《故事新编》中从生命的深度演化的角度说,出自岷江上游西羌的大禹的“禹”,其实就是“禺”,也就是“大猴子”变来的。

3 金沙遗址出土之金猴面具的审美意蕴

三星堆遗址距今已有几千年历史,曾出土了4件金人面罩,而在3000年前的金沙遗址出土的不同规格的金面具中,最为奇特的是一件金猴面具,这是世界考古史上唯一的金质猴面具,用纯金来打造猴面具,说明当时猴子是极为尊贵的称号,成为古蜀国黄金文化最具特色的代表。可以把古埃及3300年前图特卡蒙法老的金面罩与辽国陈国公主金面罩进行比较:首先是用途不同。古埃及法老金面罩与陈国公主金面罩是作为随葬品,具有起死回生的意蕴,而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却是远古蜀人在祭祀活动中的巫师表演的道具,具有

生命审美意蕴。其次是工艺与文化内涵不同。作为随葬品的金面罩表征的是生命生存期的崇高地位,而作为巫师表演的假面具象征的却是对猴祖神的崇敬,尤其是巫师头带的金猴面具更进一层,将与神进行沟通,达到人神合一的境界。因此,其虽各具特色,但其共同点则是远古人类对黄金的审美崇拜。

从世界范围看,早在公元前4000至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和西亚地区就出现了大量的黄金饰品——美的载体,并向地中海沿岸、中亚、南亚等地迅速传播。然而,都广之野古蜀黄金文明却自成审美系统,有着自身的渊源和发展演化轨迹,无疑《山海经》中的古图(包括猴类图像)便是他们的艺术创作审美的参照对象。

4 从古蜀(羌)人对猴的崇拜到祭祀巫舞表演

《山海经》中的猴类形象暗示出远古巴蜀人对猴祖神的崇拜,而金沙遗址出土的金猴面具正是在祭祀活动中的审美偶像化——巫师头带金猴面具的巫舞表演。黄金稀缺而珍贵,金猴面具是古蜀人对黄金和猴祖神的双重崇拜。因此,远古巴蜀戴上黄金面(道具)具,敲击着石磬,玉石发出清脆优美的声音,声音虽然不大,却有余音绕梁之感,人与猴祖神在这简单节奏的音乐中便开始了交通。金沙遗址出土的石磬尚能发出来自3000年前的天籁之音。石磬是古蜀王国举行盛大祭典时使用的特殊乐器。在金沙遗址这一大型滨河祭祀场所,在石磬和陶埙合奏的音乐中,人们跳起巫舞,可以驱除恶鬼、消除瘟疫。这种原始宗教意识在古老的黄帝和尧舜时代就已出现,并且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在南方的某些地区依然流行着的傩戏,也具有同样审美功能。然而,远古西南地区的巴蜀祭祀和中原不同,他们人神共欢,敬而近之。中原祭祀对神灵却是庄严、肃穆、敬而远之的。所以,金沙遗址金猴面具是人神之间的媒介——审美原型,它有两个功效:一是通神,二是娱神。在祭祀活动中,戴上假面具就是半人半神;戴上金猴面具就会给人一种生命力的神秘感、一种生命震慑力,最终获得心灵的愉悦,即审美的快感。

司马迁在《史记》开篇即说:“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13-18]。”司马迁叙说了黄帝与盆地周边的巴蜀部落的姻亲关系,蜀山氏就是居住在江水(岷江)中上游的纵目人,后迁入都广(成都)的古羌族部落分支。有学者对古羌族的族源有过系统的解说:当猿类由泰缅地区向北移进、开始向人类进化时,缘横断山猎食而进的一支在康、藏、青大草原的顶部停留下来,形成了一

个自呼为羌的民族。中国西南、西北的各游牧、农业部落,基本都是羌族的分支或与其有血缘关系^[19-21]。在西南地区发现了大量的以猿类为主体的祖先传说,与《山海经》中对猴、猿的记载相对照,很可能意味着这些民族的共同母族——古羌族最早生活的地区(即喜马拉雅山北麓)曾经有过广泛的猿猴崇拜机制。因而,由一代代王国承传了《山海经》之猴类图像文化寓意,并同时开创了三星堆、金沙遗址辉煌的黄金审美文化。

5 结语

总之,《山海经》有一个漫长的成书过程,既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写的一时一地,所以其先有图画,后有文字,最后图文并存,流传至今。本文开篇便记述了巴蜀之地的猴类形象狌狌和白猿,说明古巴蜀之地曾经是猴类聚居之地,与远古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猿猴既是人们的食材,又是人们的欣赏审美的玩物,亦是人们劳动的助手。而金沙遗址出土的金猴面具,证明古蜀人为了祭祀猴祖、巫舞表演的需要,依据《山海经》中猴类古图形象,制作了具有生命审美意义金猴面具。但这一金猴面具既不是当时猴子脸谱的仿制,亦不是《山海经》中猴类古图形象的照搬,而是远古蜀人艺术性的夸张再创造出来的崇拜半兽半神的审美。因此,不论是三星堆,还是金沙遗址的黄金面具都是自成体系的巴蜀生命审美之黄金文化的再现。

参考文献

- [1](清)汪绂.山海经存[M].浙江:杭州古籍书店,1984.
- [2](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M].成都:巴蜀书社,1985.
- [3](清)段玉裁.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4]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M].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
- [5]王小盾.汉藏语猴祖神话的谱系[J].中国社会科学,1997(6):

146-167.

- [6]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7]唐世贵.山海经与巴蜀文化[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 [8](汉)司马迁.史记[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
- [9]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 [10]曾莹,张莲.《山海经》中的海神形象研究[J].文学教育(上),2019(10):53-55.
- [11]黄震云.论《山海经》和中华文明[J/OL].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5[2019-10-24].<https://doi.org/10.14084/j.cnki.cn62-1185/c.20190917.001>.
- [12]张艺馨,刘丽莎.《山海经》物种求实[J].文教资料,2019(24):1-3.
- [13]朱勇.猕猴属动物源疾病传播风险及行为因素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4.
- [14]吴浩瀚,郑成洋,蔡光贤.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猴类资源调查报告[J].野生动物,1995(2):23-25.
- [15]王米雪,吴勇.海外馆藏明代《山海经》文字版本研究[J].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19(4):83-88.
- [16]周友谊.《山海经·山经》对十二生肖的影响与伴生[J/OL].攀枝花学院学报:1-6[2019-10-24].<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637.Z.20190723.1103.020.html>.
- [17]徐丽慧.《山海经》中的异兽形象考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9(4):104-110.
- [18]王丹林.《山海经》是最早的“图经”和“山志”[J].安徽史学,2019(4):160-163.
- [19]郑剑.《山海经》图像类别与当代动画角色模型构建美学理论体系研究[J].美术教育研究,2019(13):104-105.
- [20]陈民镇.走近《山海经》[N].中华读书报,2019-06-19(009).
- [21]彭慧慧.论《山海经》中五帝与诸神描写的五行元素[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5(4):82-87.